

# 日治時期的臺灣民間文學

文／蔡蕙如（南臺科技大學講師） 圖片提供／莊永明



◀▲《臺灣民間文學集》採錄三〇年代的臺灣民間歌謠。（圖片提供／阿亮 典藏／賴和基金會）

第一時期（1895-1926），知識分子對民間文學的蒐集，主要由日本官吏及學者為主導，這是臺灣民間文學運動的前緣。採錄者有人類學者、語言學家鳥居龍藏、伊能嘉矩，他們為了學術研究而作調查，著作有《探險臺灣》、《臺灣志》、《臺灣文化志》等。另外，部分日本官吏為了殖民政治的考量也投入採錄工作，這些成果刊登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所編輯的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和臺灣慣習研究會所出版的《臺灣慣習記事》。此外，也有日本民間文學工作者出於對異地的好奇而進行採錄整理，如宇井英《臺灣昔》、川合真永《臺灣笑話集》、平澤丁東《臺灣之歌謠と名著物語》、片岡巖《臺灣風俗誌》等。

民間文學自是存在人民生活中，一點一滴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。它本是人民生活的寫照與投射，在不同的時代、不同區域，甚至不同的族群各展現出該時、該地、該族群特有的文化或知識。它們雖然是民間集體大眾的作品，但也常常為文人所關注。

有關臺灣民間文學的紀錄，從清代志書及其他文獻已出現。文人以一種娛樂性或觀察民俗習性的態度來看待，將它們視為軼史、雜錄的一部分。到了日治時期，大部分文人仍是如此態度。但是另有一些新文學工作者自覺於他族、異文化（日本文化、世界思潮）的衝擊，促使自己尋找我族的定位，於是重新審

視這塊與自己生活文化最貼切的領域；相對的，也開啓臺灣知識分子對臺灣民間文學新的認知與定位。

日治時期臺灣民間文學的採錄工作，起源於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、伊能嘉矩所採錄的臺灣原住民神話、傳說，而止於1945年金關丈夫、國分直一所整理的《民俗臺灣》。這期間因為不同的採錄者、不同的採錄目的，其成果也就不同。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：



▲《臺灣歌謠集》為稻田尹合輯多篇的歌謠論著。（圖片提供／阿亮）



▲1934年，賴和等中部新文學人士創設的「臺灣文藝聯盟」成立大會同仁合影。  
◀1920年代臺灣新文學開始發展。圖為《臺灣文藝》的編輯群。

第二時期（1927-1940），一些臺灣傳統文人基於「趣味性」、「娛樂性」採錄民間歌謠，大多刊登在《三六九小報》。另外一些新文學工作者，或為了推廣鄉土文學的理念，或為了建構臺灣話文，以及推廣「啓蒙教育和重構民族文化」等目的而積極投入這項工作。他們所採錄整理的歌謠、故事，分別刊登在《臺灣新民報》、《風月報》、《南音》、《フォルモサ》、《先發部隊》、《第一線》、《臺灣文藝》、《臺灣新文學》等報章雜誌。此外，部分知識分子也發表對歌謠、故事的看法，對於如何研究故事和歌謠，主要有兩種立場：一、將民間文學當作民族文化的傳承，如賴和、黃周、廖漢臣、李獻璋；二、從左派社會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著手，有林克夫、劉捷、茉莉等人。除了上述兩種觀點立場外，鄭坤五、蘇維熊和曾景來則分別從傳統文學、文化的觀點針對歌謠、民間故事作專題式的研

究。

在這些背景下，1936年李獻璋將三〇年代所採錄的民間歌謠，加上約請文友分別整理改寫民間傳說及故事，編輯成《臺灣民間文學集》，是當時民間文學作品的集大成。

第三時期（1941-1945），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，日本殖民地政府加緊皇民化，逐漸停刊漢文雜誌，藉以改變臺灣人長久以來的風俗習慣，以便認同日本。如此，影響了臺灣民間文學工作。但是，日本學者池田敏雄、金關丈夫等以「保留臺灣固有的文化」為前提，於1941年刊行《民俗臺灣》。這是日本民俗學者主導，臺灣知識分子為輔，二者相互交流影響下的產物。此時期民間文學的工作目的有「日人對臺灣對被殖民『新附者』的關懷／建構「大東亞民俗學」、 「改良風俗之用／宣傳

政策」、「文學創作的材料」等。其成果是民間作品的研究多於資料的採錄整理，在俚諺、歌謠和故事方面有專題式的專論。

此外，文人仿作民間文學的現象廣為流行，比起前兩時期更為風行，尤其是以專門宣揚「皇民政策」或「個人的理念」的作品居多。另外，專書著作有：東方孝義的《臺灣

習俗》，西川滿、池田敏雄的《華麗島民話集》，稻田尹合輯多篇的歌謠論著為《臺灣歌謠集》，黃宗葵彙輯臺、日文人所蒐集作品為《臺灣地方傳說集》。

總而言之，日治時期的臺灣民間文學工作，從日本學者因應時局的所需，展開一系列的蒐集調查工作，之後，不論是日本學者、臺灣傳統文人或新文學工作者的採錄目的，並非純然只是為民間文學，而是蘊藏著各種目的。而這些目的正是因應當時的時代背景所產生，這構成了日治時期臺灣民間文學工作的時代性。



▲1942年，西川滿（右二）、龍瑛宗（左二）、張文環（右一）等人，赴日參加文學會議時合影。